

流動的成年禮：中國西南的毒品與愛滋病

劉紹華

愛滋病可視為人類史上全球化程度至深且廣的一種流行病。但它在不同地區或人群間的傳播型態與應對方式卻極具差異。本文分析諾蘇年輕男子性別認同與生命轉型的過程，理解為何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四川省境內一個貧窮偏遠、高海拔的少數民族聚落，成為海洛因與愛滋病問題的重災區。經過長達二十個月的民族誌田野調查，本研究認為這些問題之所以會出現，是當代中國面臨劇烈政治經濟變遷，由於文化衝擊與族群對立關係等複雜因素的糾葛，加上年輕人在生命轉型過程中發展主體性的嘗試時，所出現的一個不幸撞擊結果。這個複雜的社會過程突顯出一種全球的流行病，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中可能出現的多重面貌。

關鍵字：愛滋病、毒品、青年、文化差異、中國

劉紹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Email: shaohua@sinica.edu.tw）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4期，頁77-112，2012年4月出版。

投稿日期：2010年12月30日；修訂日期：2011年5月3日

接受日期：2011年5月22日

流動的成年禮：中國西南的毒品與愛滋病

劉紹華

愛滋病可視為人類史上全球化程度至深且廣的一種流行病。但它在不同地區或人群間的傳播型態與應對方式卻極具差異。本文分析諾蘇年輕男子性別認同與生命轉型的過程，理解為何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四川省境內一個貧窮偏遠、高海拔的少數民族聚落，成為海洛因與愛滋病問題的重災區。經過長達二十個月的民族誌田野調查，本研究認為這些問題之所以會出現，是當代中國面臨劇烈政治經濟變遷，由於文化衝擊與族群對立關係等複雜因素的糾葛，加上年輕人在生命轉型過程中發展主體性的嘗試時，所出現的一個不幸撞擊結果。這個複雜的社會過程突顯出一種全球的流行病，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中可能出現的多重面貌。

關鍵字：愛滋病、毒品、青年、文化差異、中國

劉紹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Email: shaohua@sinica.edu.tw）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4期，頁77-112，2012年4月出版。

投稿日期：2010年12月30日；修訂日期：2011年5月3日

接受日期：2011年5月22日

Navigating Youthfulness: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Shao-Hua Liu

HIV/AIDS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globalized epidemics in human history. Yet its transmission patterns and the social responses to it have been diverse among various localities and peoples. By examining the masculine identity and life transitions among male youths, this article seeks to answer why the Nuosu people in high mountains of Sichuan Province in Southwest China has a disproportionately large number of heroin users and HIV positive individuals relative to other peoples since the 1990s. Based on over twenty months of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a rural community, this research posits these problems as an unfortunate consequence of a highly complex social process in which drastic political economic changes, cultural and ethnic conflicts, as well as rising individuality among the young are intertwined. This convoluted social process illustrates a distinct case of the so-call AIDS pandemic in a multicultural and multiethnic society.

Key Words: AIDS, Drugs, Youth, Cultural Difference, China

Shao-hua Liu: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Email: shaohua@sinica.edu.tw)

Taiwanese Journal for Studi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Number 14 (April 2012), 77-112.

Received: 30 December 2010; Revised: 3 May 2011; Accepted: 22 May 2011

本文從性別認同與生命轉型的觀點，分析造成中國四川涼山地區愛滋病流行的複雜因素。主要目的並非探索愛滋病毒擴散後所衍生出來的各種社會問題，而是著重於彰顯人類學民族誌研究方法，如何提供有力的脈絡化解釋，將相關的青年遷徙與海洛因等社會因素，放在地方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力量的變遷中，以檢視一個公共衛生的悲劇。本文冀望能突破主流社會對於邊陲人群與疾病面貌的刻板想像，理解非主流社會文化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成為替罪羔羊的過程。藉此觀點瞭解愛滋病，基本上融合了過去二、三十年來，人類學對於愛滋病研究不同典範的特質，呈現出疾病在一個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可能出現的多重面貌。¹

理解愛滋病在此地區的流行原因，亦有助於我們反省當前愛滋病相關的研究與政策重點。自從1990年代中期愛滋病治療藥物出現以來，主要的研究與政策焦點便轉向以生物醫學有關的治療技術討論，例如：雞尾酒療法、藥物的生產與取得、有助於海洛因使用者降低愛滋病毒傳染風險的美沙酮替代療法或針具交換之減害政策（harm reduction）等。而關於此疾病的傳染及防治中的社會文化與心理面向，卻相對缺乏（Davis and Squire, 2010）。涼山的愛滋病便是其中一個顯著例子。當地政府偏向強調「科學」與「技術」，而忽視地方特性，如此不僅無法理解當地疫情及感染者的處境，在此地實施防治計畫時也容易失敗（Liu, 2011）。本文強調，理解本土脈絡應是任何疾病防治介入計畫的基礎。

整體而言，筆者認為涼山愛滋病的問題係與諾蘇社會（涼山彝

1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的修改建議。本文的資料主要取材於筆者已出版民族誌專書中的第二章（Liu, 2011），但討論目的與書寫角度則與專書有所不同，係以一個極具特性的個案，來看人類學愛滋病研究方法的特性與意義。

族)自1950年代以來所經歷的劇烈社會變遷有關。²在短短半世紀內,這個位於中國西南邊陲山區的少數民族,從原本獨立自主於藏區與漢區之間,先經歷國家強勢主導的社會主義改造,其後又面臨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的衝擊。這個族群所經歷變化之迅速、多樣,對其社會及文化造成極大的衝擊,出現許多在國家眼中棘手的社會問題。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檢視這個少數民族的近代與當代史,有如置身於一個令人震撼的社會變遷實驗室。

同時,筆者以為,導致這個社會變遷的主要動力,不僅來自於推動現代化的國家或市場之手,也存在於當地社會主體身上,包括本文研究的男性諾蘇青年。就此而言,本研究超越以往對於弱勢族群及社會不平等的理解,不單以「低度開發」或「邊陲化」的觀點,來解釋毒品或愛滋病等社會變遷的惡果。筆者亦強調當地行動主體在這場社會變遷浪潮中,所感受到的正面與負面的力量,及其展現出的主觀生命價值與意義,並同時指出這些現象在文化與族群的跨界遭逢時,被扭曲的過程。簡言之,本研究採取政治經濟學的架構,以分析諾蘇人在國家建構過程中的地位變遷,且同樣注重地方文化的特質與當事人的個人主體性。如此既能描繪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受害者的面容,亦不忽略在地社群的特殊性,也能將之放在更大的社會、國家、甚至全球化的脈絡中去分析,以掌握比較文化與社會的意義。

2 「諾蘇」為四川省涼山地區彝族的自稱。1950年代的民族識別計畫中,中國政府將一些稱謂不同的民族統整為「彝族」,但不同群體之間的語言及文化差異很大,因此本文採用族群自稱來指涉涼山彝族。

壹、人類學愛滋病研究的典範變遷

從1980年代至今，人類學已經歷三種愛滋病研究取向的典範變遷。回顧不同典範的研究面向與詮釋重點，能為本文所處理的複雜現象提供新的解析觀點。愛滋病自1980年代初期在美國被確認後，男同性戀（homosexual）社群立即被鎖定為主要的風險對象。隨即，血友病患（hemophiliacs）、海洛因的靜脈注射者（heroin users）也被列為高風險人群。甚至連海地人（Haitians）都一度列上黑名單，形成愛滋病史上一個「4H」的公衛醜聞兼笑話。1985年美國疾病管制局終於將海地人從高風險人群中移除，結束了這個荒誕的4H黑名單。然而，海地人未能就此與疾病及落後的污名絕緣。基於對海地人所承受社會痛苦的不平，醫療人類學者Paul Farmer於1992年出版民族誌 *AIDS and Accusation: Haiti and the Geography of Blame*，且一砲而紅，引領了一波愛滋病研究的新典範。在諸多醫療、公衛、與人類學界著名學者的聯手合作下，他們出版了許多極具影響力的文章與書籍，相當程度促成美國公衛界與醫療人類學界對於許多疾病與社會痛苦的新研究方向。從愛滋病最初爆發到這些研究發表之間，可謂愛滋病研究不同典範的高度交鋒期。

愛滋病毒的傳播主要是經由性接觸、血液傳染、以及母嬰垂直傳染三種途徑。最後一種途徑不屬於「行為」範疇，因此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主要的研究集中在前兩種途徑所造成的感染及其相關議題。血液傳染的研究以吸毒研究為主，愛滋病則是吸毒的後續議題。因此在研究上，也經常從毒品的研究出發，而產生與愛滋病相關的討論。反過來說，由於愛滋病的急迫性，也使得如減害政策等與毒品相關的研究議題受到重視。基於這些考量，以下在

討論典範變遷時，即以與性和吸毒行為方面的研究為主。

醫療人類學者Richard Parker (2001) 指出，關於愛滋病與性／性向 (sexuality) 的人類學研究，在二十世紀時出現了幾個方法典範的變化階段。根據毒品研究的文獻，筆者認為這些變化也同樣適用於吸毒行為與愛滋病研究的取向變遷。第一個階段始於1980年代中期，當時人類學的研究主要在於理解個人行為與疾病傳染的關係，也嘗試以心理學的理論來分析個體的行為變化。之所以會發展出這一類型的研究取向，主要是當愛滋病危機出現時，醫療公衛領域專家為了理解高風險者的行為，請民族誌田野工作者利用其專長之參與觀察研究法，來瞭解風險者的行為與行為發生的情境對愛滋病傳染的影響，以及病患與醫療衛生人員互動的情形 (Kotabba, 1990)。簡言之，此種研究取向無異於將「高危人群」視作「異文化」，希望透過日常經驗的質化研究，降低處於不同世界的「專家」與「高危人群」之間的理解與溝通障礙。其中，防治計畫的介入效果是主要考量。

這種研究取向有其貢獻。例如：Koester and Hoffer (1994) 透過參與觀察，獲得吸毒者的接納，進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觀察到在吸毒的過程中，其實潛藏了多種可能傳染愛滋病毒的途徑，打破了先前公衛人員僅注重針頭及注射器的盲點。不過，當此研究取向逐漸廣泛用於各種不同的文化社群與社會時，人類學者也開始批評這種以個人行為為主的調查重點，忽略防治計畫範圍之外的複雜文化、社會與結構交織而成的真實生活，甚至對於主流社會偏見及其負面影響缺乏反省。

本著對第一階段研究取向的批評，第二階段成熟於1990年代。此時學者著重在一些已出現模式的現象，或共享行為中超越個人之

上的因素。人類學擅長的文化意義及地方實作分析，以主流之勢進入愛滋病的研究，強調個人是承載特定文化意義的社會成員（如 Herdt and Lindenbaum, 1992; Parker, 2001; Ten Brummelhuis and Herdt, 1995）。例如：Richard Parker（1994）運用了Clifford Geertz的「經驗的親近性（experience-near）」及「本土觀點（native's point of view）」，重新檢視性行為在巴西的分類範疇。透過經典的人類學概念與民族誌研究，他說明性向在當地日常生活中的社會建構、以及愛滋病風險的分類，挑戰所謂西方對男、女性別與性行為之間的刻板概念與關連。這套方法類似於社會建構論，但更強調本土觀點的差異性。主要的論點即為「性行為從來就沒有一種舉世皆然的意義。……文化提供了差異廣泛的類別、概要、與標籤，〔讓該文化中人〕得以形塑性與情感的經驗。」（Vance, 1989: 18）此一時期，研究毒品議題的人類學者也大力推廣以全貌觀為宗旨的民族誌方法來研究愛滋病，突破主流的價值與判斷以理解個人行為的文化與結構意義（如Bourgois and Bruneau, 2000; Marshall et al., 1999）。其主要論點是，奠基於具體經驗中的民族誌提供「一種在社會脈絡中觀看與記錄行為的方法，……得以〔讓研究者〕充份理解行為背後廣泛的社會影響因素。」（Singer, 1999: 255-256）。簡言之，此階段開展的愛滋病研究，揭示了環繞在個人行為週遭的「脈絡化」與「社會建構知識與文化意義」的重要性，認定文化與社會是研究的重點。

第三階段大致從1990年代中期起算。此時人類學界火力全開，以Paul Farmer為首，針對愛滋病在全球不同地區、不同人群間不均等的流行率，強調「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才是全球流行病的罪魁禍首。抱持此一論點的學者呼籲研究者應重視造

成「高危風險」的政治與經濟因素（如Baer et al., 1997: 159-188; Bourgois, 2003; Farmer, 1992; Farmer et al., 1996; Schoepf, 2001; Singer, 1998）。此一論點很快地成為人類學與其它人文社會科學愛滋病研究的主流。「結構性暴力」所造成的社會痛苦的研究，也影響學者對於其它疾病的理解與分析（Kleinman et al., 1997）。各種形式的結構性暴力成為理解身處不同社會與歷史情境中，群體與個人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關鍵。此一觀點認為：疾病不僅改變了個人的社會關係，也突顯出疾病、社會不平等與貧窮之間的結構性關係（Farmer, 1999; Kleinman, 1995）。

以上不同的研究取向各有其適用脈絡及弱點。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第三階段的典範目前仍如日中天，但在人類學的愛滋病研究中，政治經濟學的論述始終未能完全取代文化的以及個人行為的研究觀點（Parker, 2001）。更精確的說法是，對抱持政治經濟學觀點的人類學者而言，歷史與文化的意義、以及個體論述仍是理解結構的重要介面與因素。對於重視比較文化與社會研究的人類學者來說，看似普同性的重要政治經濟結構，也可能呈現出相當的文化與社會差異。若脫離了對比較文化與社會的敏感度，分析容易流於同質而喪失其脈絡。

本文的研究主題涉及男性的遷徙與毒品使用行為、特定社會的文化與歷史、以及疾病的傳播。其間的關聯性相當複雜，無法以簡化的因果鏈來連結。因此，本研究嘗試整合不同的研究典範，將個人的行為變化放在社會文化的意義轉變脈絡下，以及巨觀的歷史與政治經濟變遷的架構中來理解。本文便是透過此方法，分析諾蘇青年男子的生命轉型與流行病的形成，以理解中國愛滋病現象中的一個特殊區域個案。

貳、中國愛滋病的重要一隅：涼山

在研究中國的流行病時，必須先注意的是，中國是個龐大多元的國家。因此，我們對於特定現象的理解，須放在不同的地理區位以及中央與地方互動的政治脈絡中。有了這層認識，才能回顧中國愛滋病問題的爆發。

國際上對於中國愛滋病問題的認識主要始於2000年之後。在此之前，僅有少數的國際組織，在中國低調地進行愛滋病的防治工作。2002年中，聯合國愛滋病總署（UNAIDS）駐北京辦公室公佈了一份報告，名為《愛滋病：中國鐵達尼號般的危機(HIV/AIDS: China's Titanic Peril)》（UNAIDS, 2002）。文中估計，當時中國感染愛滋病毒的人數高達八十五萬，專家們甚至認為實際上不僅如此。爾後，中國政府也加快步調與各類國際組織合作，擬訂愛滋病的防治計畫。2003年中，在愈來愈多學者與國際人士的鼓吹與介入之後（如Kaufman and Jing, 2002），中國政府更加開放與積極處理這個棘手的全球流行病問題（Kaufman et al., 2006）。

2002年UNAIDS發布這份全球矚目的報告時，筆者也在記者會現場。透過中國中央政府的報告與行動計畫，筆者發現不同地區的各种問題。例如：報告指出，中國因吸毒引起的愛滋病感染比例相對偏高。此外，儘管少數民族的總人數僅佔中國總人口的8.4%，但當時少數民族的愛滋病感染率卻遠高於漢族（UNAIDS, 2002: 61）。2002年時，筆者因緣際會選定了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作為田野研究的地點，此地被中國政府列為愛滋病的重災區。

引導筆者進入涼山的主要研究問題是，2000年當英國國際開發總署（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與中國政府合

作的愛滋病防治計畫，進入涼山調查愛滋病的分佈時，發現人口數約一百八十萬的諾蘇，不到四川省人口比例的3%，但其愛滋病感染者卻佔全省已發現人數的59.6%（China-UK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are Project, 2001）。即使我們對於當時統計方法的取樣與分析有所疑慮，但這個初步發現的確令人震驚。

涼山位於四川省西南角，面積約六萬平方公里，隔著金沙江和雲南省為界。當然，筆者實際上進行深入田野調查的範圍並非涼山整體，而是其中一個地屬高山盆地區域的利姆鄉（代名）。那裡被認定為重災區中的核心災區。當筆者初次進入田野，嘗試了解為何涼山諾蘇地區的愛滋病問題如此嚴重時，得到一些乍聽有理、卻又無法充分解釋現象的理由。醫療公衛學者或官員的說法諸如：因為涼山很窮、諾蘇文化落後、當地年輕人吸毒又偷東西……等。在地人類學者或民族學者的回答也相去不遠，但會冠以社會科學的術語，例如：以「中心—邊陲」的對立來說明涼山的落後。或者，也嘗試尋找遠因，例如：涼山自古就是鴉片種植地；言下之意是，以前抽大煙，現在吸海洛因也就不足為奇了。在筆者後來的研究中，仍持續聽聞這些說法，我也並不完全否認其理由。不過，筆者逐漸發現這些說法缺乏對在地的深度理解，以致於貧窮、邊陲、文化、或偏差行為等都成為解釋現象的遁詞。

換言之，如果上述理由足以造成涼山諾蘇的毒品與愛滋病問題，那麼其它類似的地區或族群應該也有同樣的問題。不過，僅以四川的少數民族而言，鄰近諾蘇的藏族與其他少數族群的愛滋病問題就沒有這麼嚴重。「邊緣化」、「貧窮」、「落後」、「鴉片歷史」、「漢化程度低」等等說法，都不足以解釋為何涼山諾蘇的這些問題，比起社會經濟地位同樣低落或有類似鴉片種植歷史的其他

族群更為嚴重。問題的複雜性顯然無法透過單一因素便能解釋。

一般而言，毒品問題的出現主要是從都市開始，因為必須先有「機會」與「金錢」取得這種物質，才會廣泛流通使用。農村一向不是暴利商品的主要銷售地，都市中的毒品問題通常較農村普遍。涼山農村面臨的問題的確與都市有關。在涼山進行愛滋病研究的學者或衛生官員，很快便發現毒品與愛滋病在地方上的迅速擴散，與年輕人的外移有關。在流行病學上，兩者間的因果關係很清楚。不過，令筆者好奇的是：如果當地年輕人會在外地感染愛滋病毒的話，為何身處外地的其他族群並未面臨同樣嚴重的問題？儘管我們知道疾病與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但其中的曲折過程是否便可以如此一語道盡？涼山的情形是否有其特殊性？人類學對於比較文化與社會的敏感度，讓筆者一開始就對這個因果關係產生進一步探索的興趣。

筆者以為要回答這個歷史過程的問題，深度民族誌調查是最有可能解惑的研究方法。透過長期細緻的民族誌田野調查以及歷史分析，將個人、社會文化、國家、乃至全球化的力量，同時放在一個彼此交錯的生活場域中來檢視。民族誌研究的特點之一，便是將一個較小範圍的研究，放在一個巨觀的環境脈絡中，既不忽略地方特質，也得以同時發展歸納與普遍推論的分析。換言之，位於高山盆地的村寨雖是筆者的研究地點，卻並非唯一的研究焦點。選擇這種方法來理解複雜的社會現象，有其優勢與限制。優勢在於其研究表象下的深層意義，並將之放在政治經濟結構與日常生活脈絡之中。限制則是耗時費日且經常困難重重（劉紹華，2010a）。自2002至2009年間，筆者在這個山區農村裡進行田野調查的時間，長達二十個月，其中包含了2005年一整年。筆者以民族誌的田野調查，結合

參與觀察、開放式訪談、生命史訪談、以及小規模的家戶訪查等方法，佐以歷史及社會文化變遷的分析。我在此一共深入訪問了五十六位報導人，主要包括吸毒者與愛滋病感染者，以及氏族長老等傳統權威人士、衛生人員和各級政府官員等，才得以完成關於涼山諾蘇地區的毒品與愛滋病的民族誌專書（Liu, 2011）。在本文的分析中，僅針對造成愛滋病問題中的性別相關行為。而在另一篇討論民族誌研究方法的文章中，筆者已剖析過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性別互動對於本研究的影響（劉紹華，2010a），在此便不再詳述。本文著重的性別意義，是其對年輕男子開展生命旅程的影響，進而不慎導致愛滋病問題的出現。

參、巡迴遷徙：一場性別認同的曲折生命轉型

因受到人類學愛滋病研究不同典範的影響，本研究在分析青年行為及其衍生的意涵時，同時兼顧個體心理層面、社會文化意義、以及政治經濟力量的交錯。由此觀點調查諾蘇青年的遷徙，與主流移民研究的方法與觀點有所不同。目前中國流動人口的研究，主要是針對農村至城鄉的打工人群，且傾向較為長期的遷徙類型，關於所謂的「盲流」研究實則甚少。此外，也多以漢族的移民為主要研究對象。這不令人意外，因為漢族人口佔全國總人口比例高達九成以上，也多來自擁擠的中原或沿海省份，人口向外移動尋找生計是常見的現象。只是這樣的現象分析可能忽視中國社會的多樣性，尤其是少數民族移動經驗的特殊性及其可能的社會意涵。

回顧一些先前的移民研究，對於我們理解人群遷徙的多元行為動機有所啟發。傳統上，經濟因素被視為最主要的遷徙動力。

即在強大的結構性外力影響下，個人基於經濟理性的評估而做出遷徙的決定。不過，也有學者批評這樣的分析觀點太過絕對，忽略了人的情緒或其它非經濟因素。例如：移民研究學者Paul Boyle等強調「意義」對於特定社會文化中不同人群的遷徙影響（Boyle et al., 1998）。此外，也有學者從性別的角度來取代經濟決定論的觀點，認為不同性別的遷徙動機與模式可能有所不同（Willis and Yeoh, 2000）。甚至有學者進一步強調，即使是同一性別，也可能因為階級或性向等社會差異，而出現截然不同的遷徙動機與模式（Donaldson et al., 2009）。另有學者以不同心性年齡做為切入移民研究的角度，提出生命史的方法（biographical approach），來研究歐洲的農村—城鄉青年移民（如Halfacree and Boyle, 1993; Ní Laoire, 2000; Stockdale, 2002）。這種以人文精神為主的生命史研究方法，也隱含在其它研究之中。例如：Pun（2005）對中國「打工妹」的描述，指出她們大多於青春期中與婚姻之間到外地打工。在城市打工這段經歷可謂這些年輕女性練習與享受「自由」的機會，至少得以暫時遠離農村的家鄉與婚姻的桎梏。儘管這些研究似乎是針對較為普遍的人性特質，缺乏地方社會文化特色的討論。不過，其超越傳統經濟決定論、或簡單推—拉理論的解釋，對於我們理解諾蘇青年在1980及90年代的外移行為仍具相當的啟發性。

在本節中，筆者透過非經濟決定論的觀點，分析諾蘇青年的遷徙經驗，並稱之為「遷徙的文化性」。其特色為：短期巡迴式的流動，充滿社群文化性與個人情緒因素，以及在某一生命階段近乎雷同的行動模式，均充分呈現出中國社會的多元性。

涼山諾蘇的歷史很特別，原因在於此族群在短短半個世紀內就經歷過三種截然不同的社會體制。這樣的鉅變對於我們理解其當

代流行病的問題具有重要的背景意義。1950年代之前，諾蘇基本上是在一個與國家無關、獨立自主的部落社會狀態。其社會內部沒有流動貨幣資本與交易市場的概念與機制，是一個完全親屬導向的階層社會，依賴自足農牧維生。在約為台灣一點五倍大的地理範圍內，只有幾十個大氏族，沒有超越氏族之上的政治組織，沒有一統的國家，所有的社會治理都是根據充滿地方差異的習慣法而定。因此，1950年代以前，諾蘇被外界稱為「獨立儼儼」或「夷民」（林耀華，2003[1947]）。

歷史上，諾蘇社會是一個嚴密的階層社會，有五個明確區分的階層，包括兩種貴族（土司、黑彝）、平民（白彝）、及兩種等級的奴隸。該民族在1950年代時被中國政府認定為二十世紀中國僅存的奴隸社會。在共產黨「解放」涼山以前，除非能夠得到有權的諾蘇貴族保護，否則任何外來勢力皆難以進入涼山的腹心地區。諾蘇會俘擄外人（尤其是漢族）當奴隸，所以夷、漢之間的族群關係一向非常緊張。

1950年代以後，中國共產黨正式掌控涼山。自此，諾蘇社會從「前國家」的獨立狀態，被納入社會主義的國家計畫之中。由於集體公社制度之故，此時諾蘇主要的活動範圍仍侷限於涼山境內。而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也使得大多數依自足農牧維生的諾蘇，對於貨幣與商品的市場交易仍維持有限的接觸。涼山是當代中國現代化發展中的邊緣末梢。過去「獨立儼儼」的「奇風異俗」與鴉片種植的歷史，也為諾蘇帶來了社會歧視與污名，被國家及其他族群視為「落後民族」。

改革開放後，涼山又經歷了另一大轉變。1980年代左右成長懂事的新一代諾蘇青年，在即將探索與開拓人生歷練的時刻，市場

改革所倡導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悄然地來臨。諾蘇傳統的社會安全網絡，已遭受國家政治行政體制的弱化；而先前建構的集體公社安全網，在市場衝擊下也突然撤銷。新一代的諾蘇青年被夾擠在過去以部落社群為主要生計單位的道德經濟規範與開放的商品市場邏輯之中。他們對於這個世界的空間想像突然擴大，父母前輩未能傳遞任何面對此種時代的經驗，年輕人勢必得自行摸索應對（Liu, 2011）。

1980年代初起，涼山的年輕諾蘇男子開始向外流動。利姆鄉正是其中一個主要的人口外流社區。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是，本地有限的糧食生產難以應付不斷增加的人口。此外，從傳統文化的觀點來看，涼山諾蘇一向也鼓勵男子翻山越嶺為氏族與個人家庭開疆拓土，以武力械鬥的方式搶奪敵人的兵力、財物。他們從來就是習於「參戰旅行」的民族，標榜「雄武為男子之美德」（馬長壽，2006：374）。甚至有研究者認為，這個民族具有類似「斯巴達」的尚武精神（Liu, 2001）。諾蘇傳統文化所強調的個人能動性，在改革開放後終於獲得鬆綁。現代交通設備的協助，亦讓他們能走得更遠。1990年代，隨著中國政府人口流動管制的鬆弛，加上當地遷徙經驗的累積，男子外移的情形更為明顯。當時，他們外出的主要動機大多是去「看看世界」、「去耍」。

海來日則（代名）是1980年代初利姆社群中最早外流的年輕人之一，他的經驗可為一例。日則和一個氏族兄弟走了一整天的山路，到了火車站，看到從南邊來的一輛貨運列車上坐滿了諾蘇年輕人，他們也跳了上去，就這樣到了涼山北邊一個不知名的城市。我問他那時為什麼跑出去？他結結巴巴地說：「就是想去看很大很大的城市。」不過，那一次他並沒有看到很大的城市。他們下了火車

已是半夜，此時遇到一名來自不同區域的陌生諾蘇男子惡狠狠地問他們：「你們來這幹嘛？」兩人隻身在外，沒有其他熟悉的同伴，嚇得又跳上另一輛回程的貨運列車，回到了原來的火車站，然後又走了一整天的山路回到家。不過，這趟失敗的驚險之旅並沒有澆熄日則後來繼續往外跑的渴望。往後七、八年間，他頻繁地來回涼山與成都等地。照他自己的說法，他沒有本事行竊，但透過嫻熟的人際網路，在城市裡靠著協助其他諾蘇男子販售贓物掙錢。

在1980及90年代時離開涼山流動到成都、昆明等都市的青年男子，他們依照原有的氏族與地域網絡，一個跟一個、一群跟一群地接踵到外地。男性氣概與兄弟情誼在他們的遷徙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在都市裡經常餐風露宿，但有自己的聚落。也常打架鬧事，但運用傳統諾蘇男性解決紛爭的方式在都市進行調解。這些具有性別認同意味的遷徙行動，主要發生於某個年齡階段。他們有許多共通特質：第一次外移的年紀多在十五至三十歲之間、在涼山和都市之間頻繁地來回流動。他們絕大多數沒有受過學校教育，不會說漢語。既沒有身分證，又缺乏在都市謀生的技能，而且剛開始外出的目標很模糊。進入這樣的旅程，除了牽涉到他們對於自身社會文化中男性特質的界定想像，也突顯出一種當地青春期的生命轉型過程。因此，筆者藉用「通過儀式（rites of passage）」的「成年禮」概念，來進一步分析1980及90年代前仆後繼外移的諾蘇青年男子。

Arnold van Gennep（1960[1908]）最早使用通過儀式的概念，來分析個體在不同生命階段與社會的關連。所有的通過儀式都包含三個階段：即分離（separation）、過渡（transition）、與整合（incorporation）。以傳統社會中「成年禮」這種通過儀式為例，當兒童要轉變為成人時，透過制度化的儀式讓他們離開原本的結構位

置，也因而暫時脫離既有的價值規範或行為情緒，最後象徵性地導引參與者進入另一個階段，完成儀式。人類學者Victor Turner（1967, 1969）更進一步分析通過儀式，將其中的過渡階段稱為「中介階段（liminality）」，這是一個在離開舊秩序、形成新規範之中，一個令人深思反省的階段。Turner指出，雖然一般常將通過儀式的觀念用於分析傳統社會中的制度性儀式，但事實上，通過儀式所隱含的個體與社會的結構性關係與階段性，也存在於所有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例如，眾所周知的嬉皮年代。

藉由「成年禮」這種通過儀式的隱喻概念，筆者得以掌握諾蘇青年幾乎是集體性巡迴遷徙的時代意義，與一般移民研究中的經濟理性概念或主流漢族經驗截然不同。欲瞭解這個現象，我們亦必須理解諾蘇社會對於「青年」的概念。在許多社會中，將十五至三十歲的男性視作同一個年齡層似乎不太合適。不過，諾蘇社會對於「年輕人」的概念，和主流社會科學論述或漢人社會的定義不一樣。一般的生命階段分類是：兒童、青少年、成年、中年、老年，並且對這些年齡層有特定想像，例如青少年就是躁動不安，或被壓抑的生命階段。似乎這些階段的分類與特質放諸四海皆準。不過，人類學的跨文化研究早已指出，這種分類只是基於西方本位主義的標準所產生（Mead, 1928）。

諾蘇社會中，女性有很明確的制度性成年禮，以清楚劃分女童轉變為可以嫁人的成人；反之男子卻沒有類似的制度性儀式，來規範此生命階段的跨越。社群中的成年人會鼓勵十三、十五歲（諾蘇以奇數為吉）的男孩參加一些公開的社會活動，讓他們參與公眾事務（例如氏族會議），學習男人的樣子與規矩。大約在十五至三十歲這個階段，就是諾蘇男子學習展現陽剛特質，與逐漸邁入成年的

一段相當具實驗性的生命過程。進入與終止這個階段的時間，可能因個人氣質、生存技巧、社會成熟度、以及家庭狀況而有別。一般過了三十歲就被認為是「老人」。「老人」在此並不是耆老的概念，而是就不再是「青年」了。

對年輕諾蘇男子而言，「青年期」是探索現實世界最重要的一段時間。把這樣具有社會文化特色的生命階段，放在當前充滿文化、族群與社經地位差異、以及主流偏見的異鄉社會中，可想而知，「成年禮」的過程必然困難重重。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這些流動青年在城市裡幾乎找不到工作，而且備受歧視。其中藝高膽大的青年，為了維生或籌措車資返家而開始偷竊搶劫。很快地，愈來愈多離鄉在外、無所事事的年輕人學會了這種非法獲取金錢的便宜之計，收穫豐碩者甚至成為大家羨慕的對象。用贓款買來的或偷來的時髦商品，如：電視、手機等，也很快地在外移青年中流行開來。「有辦法的」年輕人也買來送給家鄉的親友，返鄉時成為尚未外出的年輕男子或男童欣羨的對象。

歷史上，對諾蘇而言，在勢不兩立的漢族地區打家劫舍是驍勇善戰的表現。即便今日諾蘇已被納入以漢族為主的國家體系中，族群間的敵意與衝突仍是不得明言的禁忌，根深柢固存在他們的歷史記憶中。這批青年很自然地用過去緊張的夷、漢關係，來合理化他們在都市裡的非法行徑。然而，結果便是許多年輕人被抓入監，甚至在偷盜的過程中受傷、死亡。而他們的非法行徑所造成的族群形象，亦使得他們在都市裡的生存處境更為艱難。以成都為例，當地漢族為主的都市居民對諾蘇充滿恐懼與刻板印象。1990年代中期，成都警察機構甚至一度組成治安專案，鎖定都市中的諾蘇及藏族青年。

一般對中國「流動人口」或「農民工」的描繪是，一去多年，賺了錢才久久返鄉一次。相較之下，這些諾蘇青年的外移像是玩票性質。他們對於漢族男子汲汲於蠅頭小利的打工或經商做法經常表示不屑，認為那是女人才做的事。這些諾蘇青年出去的時間大多不長。他們不慣於在外地久待，出去的時間主要在農閒期。由於地理氣候之故，涼山的農閒期相當長。以利姆鄉為例，農閒期長達五個月。秋收、諾蘇新年、季節性的儀式活動、親友過世、或者家裡有事時，很多外移的青年男子便會返家。對大多數的諾蘇青年男子而言，在1980及90年代，流動是一場生命歷練，更勝於務實與營利的行動。

馬海布都（代名）是一位在2005年時二十八歲的男子。從他的回憶中，可以看出他最初的外流動機與男性自我認同有關。這個認同的強化或轉型，是一場理想型傳統概念在面臨快速社會變遷後出現的對話結果：

我十六歲就開始吸毒了，是在外頭耍的時候跟別人吸的。

〔那時〕每個男娃娃都出去耍，都走完了。出去的人穿得乾淨、吃得好，我想那才是男子漢，我開始想跟他們一樣，所以就跟著出去了。第一次偷幫人抓風，就被抓了，關了兩年，在〔牢〕裡面長大的！我們這裡在裡面長大的不少。在裡面的時候什麼都想啊！想出來以後再也不要出去，聽父母的話，種莊稼，早些富起來，但一出去就什麼都忘了！大家都出去找錢，我又想出去了。這裡沒錢，外面才找得到錢。這就和我們種莊稼一樣，就是生活嘛！習慣了。外面的風景比家鄉好，外面好耍，找不到錢也要出

去。……歲數大了體力不行了，自然就不出去耍了！差不多三十五、四十歲的時候吧！

肆、鴉片類物質與男性認同

1990年代，從緬甸與泰國邊境的金三角走私入中國的海洛因，讓諾蘇青年的流動歷程變得更為複雜。這種全球流通的成癮物質，讓他們再度調整其男性認同與行為。早期接觸到海洛因的諾蘇年輕人，對於這種藥物有種特別認知。在諾蘇語裡，鴉片及由鴉片提煉出來的海洛因是同一個字yeyi。前面提及，傳統諾蘇社會的階級分明。在1950年代以前，鴉片種植為諾蘇貴族（即土地擁有者）帶來了大量的財富與槍枝。鴉片交易改變了諾蘇貴族和漢族的關係。當時諾蘇土地擁有者，首度以種植經濟作物的方式和漢族進行交易，他們獲得的物品中最為顯著的是槍支與白銀。槍枝大量流入涼山，諾蘇變得更為強勢，且更具實力擄獲漢族當奴隸（林耀華，2003[1947]；Zhou, 1999）。在中國，尤其是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諾蘇的強勢實屬罕見。其中，鴉片扮演了重要角色，主要原因即在於諾蘇是鴉片的生產者。因此，鴉片在諾蘇的集體歷史記憶中，是個具有經濟利益、階級地位，以及時尚意義的物質，如同諾蘇諺語所云：「鴉片是土司的糖果」（劉紹華，2010b）。當在都市流動的諾蘇青年接觸到海洛因時，他們發現這種新興物質和傳說中的鴉片一樣好，不少使用者表示：「吃了就和神仙一樣。」很快地便把海洛因當作代表流行與享樂的商品；消費海洛因象徵購買力，而購買力的高低也反映了他們在都市中生存本領的能耐。此時海洛因對他們而言，並非主流社會所界定的「毒品」（Liu, 2011）。這種新興商

品被返鄉青年帶回高山盆地的村寨後，幾乎令所有在地青年趨之若鶩。

1990年代中期，海洛因在諾蘇青年中流行的情形，可以透過一名已戒除藥癮的青年窺知一二，該青年表示：「以前年輕人你不吸毒看不起你。以前吃這個好耍，朋友來，我殺豬給朋友，朋友不高興。買這個給他就高興了！」那時對他們而言，吸食海洛因在個人享受以及男子社交上都是值得追求的行為。就和筆者相識的、仍在偷偷吸食鴉片的諾蘇老人一樣，追求這類物質的初始動機是為了「面子」。

只不過，海洛因可稱得上是精神刺激藥物之王，在形形色色的各式成癮物質中，其上癮潛力最強（Ray and Ksir, 2004: 37）。海洛因進入體內後，會轉換成嗎啡，與腦部先天的鴉片受體（opiate receptors）產生作用。這些受體位於腦部中控制疼痛、呼吸、情緒以及中樞神經系統的部位，能夠辨識各種鴉片類物質。海洛因中的嗎啡成份能夠抑制神經傳送痛感，以達到消除疼痛的作用，也可以釋放焦慮、鎮定肌肉、引發睡意、並製造幸福與滿足的感受（Singer, 2006: 45）。如此強大的成癮能力，讓被列為非法毒品的海洛因在全球市場上的價格始終居高不下。離鄉在外的諾蘇青年，也許可能偶爾透過偷竊或販毒獲得財富，但大多數人的收入終究不穩定。在手頭拮据又藥癮難耐的情況下，將海洛因的使用方式由吸食改為注射便是可行的經濟手段。不幸的是，因為採取了不安全的注射（如共用針具），而導致愛滋病毒在諾蘇男青年中傳播開來。1997年，利姆鄉通報了第一例因不當注射海洛因導致的愛滋病感染。之後十多年，利姆鄉便處在不斷與海洛因和疾病交戰的狀態。

伍、通過儀式的完結

在1980及90年代，這段筆者稱之為「當代男子成年禮」的生命過程中，利姆鄉的諾蘇青年經歷了巡迴遷徙、海洛因、非法行徑等生命歷練。他們如何完成生命中近乎一致性的通過儀式？

1990年代中期至末期的數年間，海洛因進入諾蘇青年的生活之中，他們對它的想法從時尚物質，逐漸轉變為「毒品」，也開始使用漢語的「毒」來指涉海洛因。主要的轉變原因是，海洛因帶來了一連串預想不到的健康與社會問題，如：疾病、偷竊、無心工作、盜賣田產、甚至因打針而引發意外死亡等，造成利姆鄉嚴重的社會失序。整個利姆社群對於農村人口外流與海洛因的看法因而大為改觀。這些有能力外出的年輕人曾被認為是社群中的佼佼者，如今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政府也逐漸開始強力介入。至此，外流與海洛因所彰顯的意義已從象徵正面的男子氣概特質，轉為類似主流社會中的偏差行為。換言之，海洛因在此諾蘇社群中經歷了一場道德經濟的轉變（劉紹華，2010b）。

這一代青年男子在此生命過程中展現出的行為，交雜了性別認同、渴望、私心、虛榮、勇氣、懦弱、與意志力等等的個人及文化因素。他們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文化與歷史、以及社會經濟地位低下的處境，使得他們展現個人情緒的歷練至為不幸。年輕人因深受成癮之苦而陸續嘗試戒斷海洛因。當地的村社幹部以及氏族長老亦開始介入，結合傳統的宗教儀式咒誓與親屬組織的連坐約束，企圖以此管束年輕男子不再外流、或者強制戒毒（Liu, 2011）。一開始，這些做法在當地社群引起很大的迴響，父母、妻子冀望青年男子能回頭是岸。

戒除海洛因需要相當的毅力與時間。缺乏堅強的意志力與社會支持，將很難達成目的。不論成功與否，每個戒毒的故事都令人感嘆，從中可見個人的努力與諾蘇社會忠誠的家庭與氏族支持。現年四十歲的吉克拉則（代名）曾經耗盡販毒所得，花費近十八萬元人民幣吸毒。經歷了生不如死的戒毒過程後，利姆的同鄉並未因其荒唐的過去而放棄他，反而因此肯定他的決心與毅力，讓他在戒毒成功後當選村長。他的故事讓我們得以一窺艱辛的戒毒過程：

95年11月20幾日過完〔諾蘇〕年後就到美姑〔註：鄰縣〕去，那時美姑沒毒品，這裡太多了，我就到美姑躲開毒品。我的舅子〔妻子的弟弟〕為了他的姐姐和甥兒，想我戒毒就陪我去美姑。我的老婆賣了一頭豬得了700元，只買了兩克〔毒〕，給我慢慢吃。我的癮太大了，得慢慢壓下毒。一克分十包，後來一克分二十包，兩克就用完了。兩個月後，我買了安眠藥五盒，一盒50元，戒下來後，我就吃安眠藥。

怎麼戒的我都不記得了。我鞋都沒穿就上街了，人瘋了。我舅子給我買了一雙鞋，他看到我，哭了，我也哭了。我走到美姑親戚家，〔親戚〕殺了一頭豬，老媽子哭了，說：「你的祖子都好好的，你怎麼麻成這樣，連狗都不如了。」我對不起這些親戚，她哭了，我想死了算了。我住在她家兩天兩夜，我什麼都搞不清楚了。第三天我的舅子喊我起來吃飯，他扶我起來時，我看到前面一個圍牆好像一座大高山，死的活的我也搞不清楚了。我的舅子哭了，

我也哭起。我就跳到水裡去了，我的舅子把我拉起來。我想吐，吐得全是血，第二天就好一點了，如果不吐血我可能就死了。但我的心好像掉了，走不起了，得靠舅子扶。我對他說：「我該死了。」他說：「你活，你全家就活；你死，你全家就死。」我那些家門〔註：氏族〕為了我的老婆和娃兒，都要我活著、戒毒。我戒毒的時候頭髮一把抓就一百根，現在頭頂都禿一塊了。

96年6月25還是28日，我戒毒成功了，從美姑回來了。我的媽媽走過來，說：「死了一道又活回來了。」家門全哭了，大家高興了。我的老婆餵了一頭豬，我想打雞、殺豬，向家門說：「從今天起，我再吸一口，就自殺。」但我的老婆不信我戒毒了，那時我們鋪子上很多人都說戒毒成功了，但第二天又吸毒了。我的老婆就說不要殺豬了吧。我叫她殺，她信了，眼淚都哭出來了。

利姆社群運用不同的象徵力量——親屬組織以及傳統信仰——試圖約束年輕人。這些當地特有的文化制約力量，在這一代年輕人的戒毒歷程中具有重要但並非關鍵的作用。真正的效力其實來自於年輕人努力跳脫現況的意志力（Liu, 2011）。曲比木嘎（代名）是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他運用了諾蘇信仰的象徵力量，讓自己與表兄弟成功戒毒：

我們這一口都沒吸過的幾乎沒有。……我是在北京戒的。在成都、昆明太多毒了，北京沒有，我就說要到北京去

打工戒毒。我大舅要我和他戒毒，我不想，他戒毒的条件太不好，我看過他把古者〔註：木嘎的表兄弟〕他們的手腳綁起來戒毒，太可怕了，我不要。我要到北京去戒毒。我到北京看醫生輸液〔註：吊點滴〕戒毒……，在醫院戒了五、六天就好了。剛開始那一、兩天特別難受，不是頭痛，全身都痛。後來好了，沒吸毒了。我回來說我戒毒了，我爸爸媽媽不相信，我爸爸說這裡到處都有人說戒了，但是幾天後又吸了，他們不相信我真的戒毒了。後來在家裡待了幾天，他們看我真的沒有吸毒，就相信了……。

我從北京戒毒回來後，和朋友一起耍，朋友在吸毒，問我要不要吃一口。他們都是勞改兩、三年回來的。很久沒吸了，我怕再吸，就自己決定打雞、喝雞血〔註：下重誓〕。我問曲鐵〔註：木嘎的表兄弟〕要不要一起，因為是兄弟嘛！所以我問他。但是我要他想清楚，真的不吸了才能喝雞血，不然會死人的。我不能逼他，要他自己決定才行。他說他不吸了，我們就打了雞。我說了我的和曲鐵的名字，我說：「從今天以後，甲巴曲鐵和曲比木嘎要是再吸，第一天吸第二天死。不吸，以後就平安。」我相信雞，曲鐵也相信雞，因為是我自己說的話。打了雞、喝了雞血，會怕的！很多人打了雞以後再吸，有人死、有人身體不好、也有人作生意不好。我相信雞。要是別人打的雞，我不相信，但這是我自己打的，我不敢再吸了。

堅強的意志力、忠實的社會支持、以及傳統信仰的象徵力量都協助吉克拉則和曲比木嘎成功遠離海洛因。但是，每個人的情況與能耐不見得一樣，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順利戒癮。有些人屢戒屢吸，也有人戒了好一陣子，後來又因各式原因偶爾犯戒。以下是一名諾蘇青年男子在2005年時向筆者敘述的故事，可為一例：

我上過癮。老實告訴你，我進過戒毒所，在成都戒毒所關過三個月。……給我們吃戒毒藥，不知道叫什麼名字，紅色的藥和開水和在一起喝，早、晚一次，幾天就不吃了。一天吃三頓飯，公安不打我們，但犯人打，老的打新來的，不分民族，公安知道犯人在打但不管。……不知道為什麼老的要打新來的？可能關煩了，想出去吧！……一間關十幾個人，……我的肋骨被打斷過，我打不贏人也說不贏人，我活該嘛！誰叫我吸毒！……我出來後在家裡待了兩、三年才出去打工。……我和你說，不到十幾年，毒是戒不掉的。我喝醉酒了還是偶爾會吸一口。

大約自1995至2005年的十年間，利姆鄉經歷了數度波折起伏的社區反毒戒毒運動。大致而言，在缺乏有效的醫療衛生以及實質的經濟介入，這些努力逐漸式微。年輕人有自己的想法與限制，傳統象徵力量的介入並未能達成社區完全禁毒的目標（Liu, 2011）。不過，近年來海洛因的影響力的確減少許多。除了個人與社區的努力之外，死亡也是吸毒人數減少之因。根據氏族長老的統計，2001年以前利姆及其鄰鄉就有275名男青年因使用海洛因而身亡。更重要的是，長老們坦言，他們至多能針對反毒採取行動，但對於2000年後

陸續爆發的愛滋病問題幾乎束手無策。流行病出現後的問題，已超越他們所能應對的範疇。

這個發生在利姆鄉的不幸結果，也發生在其他傳統的諾蘇社區。涼山的毒品與愛滋病的問題，最初主要集中在涼山諾蘇腹心地區的昭覺縣（利姆鄉為其轄下）與布托縣、以及人口流動頻繁的州府西昌市，後來擴及至另一諾蘇腹心地區的美姑縣。2007年時，涼山所有的十六個縣市都已通報愛滋病的感染，已知案例至少超過六千名。主要的傳染途徑是不安全的靜脈注射海洛因所致，年輕諾蘇男子仍是最主要的感染者。近年來，當地政府開始關注愛滋病傳播的其它途徑，例如：在每年的農村婦女檢查時，一併檢查是否有母嬰垂直傳染的情形。至於與性相關的傳染風險，由於性行為的隱蔽性高，不似在監所得以強制抽驗吸毒者的血液，也不似農村婦女檢查的例行與強制性，因此性行為造成的傳染風險情況不明。2000年代初期以後，涼山愛滋病問題的後續發展已成為另一個複雜的醫療與社會科學議題了（Liu, 2011）。

回頭審視1980及90年代生命歷程波折起伏的那一代年輕諾蘇男子，他們在十多年間的經歷有如一場集體性的生命試煉：其活動空間突然擴大，滿足了他們向外流動探索的渴望與自由，在異鄉他族的城市裡縱情青春，吃過各式各樣的苦頭，甚至感染疾病；所有的人在這段過渡青春期中體悟深刻，也付出代價。以2005年時的利姆鄉為例：當地十五至四十歲之間的男性，七成以上有過外移和吸毒的經驗，四成以上坐過牢，主要都是因為吸毒、偷竊或販毒被關。這裡將調查對象的年紀延伸至四十歲，是因為在1980及90年代開始外移的青年，到了2005年時有些都已四十歲上下。更不幸的是，有人完全無法脫離海洛因，他們似乎未能從這場通過儀式中走出

來。在此中介階段停留太久的結果，讓他們一直處於中間混沌狀態（limbo）。未能返鄉重拾原有的生活，也未能在城市中尋得合法的生計，對海洛因的依賴讓他們身心俱疲，生病與死亡成為常態。

儘管有人仍繼續深陷其中，但多數的人不論健康與否，都試圖脫離此過渡狀況，開始尋找出路。不少人覺得年紀大了，返家後不願再外出流浪，決定留鄉務農平凡過日子；也有人帶了一身病回鄉休養；有人在流動期間學會了漢語，找到建築工地的工作，開始合法賺錢生活，甚至帶領其他諾蘇鄉民外出打工。當愈來愈多的涼山青年外移，他們在城市裡的社會網絡也逐漸擴展，在都市裡面的合法生存機會也因此增加。如今，新一代的諾蘇年輕人在城市中所面臨的社會情境已與過去不太一樣。

陸、結論

透過分析遷徙的文化內涵及其相關後果，筆者以為，四川所有族群中，諾蘇的愛滋病人口比例最高的初始原因，是中國當代劇烈的政治經濟變遷，以及諾蘇群體面臨文化衝擊與對立性族群關係等複雜因素的糾葛下，加上這些年輕人在此歷史轉型過程中，受到傳統文化影響所發展出的個人主體性嘗試時，所出現的一個不幸撞擊結果。我們應該可以說，這是當地諾蘇社會進入改革開放市場的一個過渡陣痛期。若僅透過單線的因果關係推論，將無法理解其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愛滋病是一個充滿了當代社會意義的流行病（Treichler, 1999）。關於此疾病在不同社會與人群間的傳播型態與應對之道，與其說是個生物醫學的問題，毋寧說是特定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的

產物。因此，比較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愛滋病所彰顯出的地方特性多元且複雜。和許多地區一樣，中國並非一個巨大同質的文化或族群體，實際上充滿了地方差異。必須透過「微觀流行病學（microepidemics）」的觀點，將個人的行為放在特定的社會文化及政治經濟的脈絡中去分析，才能理解愛滋病的地方表現及其影響，並藉此發展出合宜的防治對策（Beer, 2008）。

以這樣的複雜觀點出發研究涼山地區的愛滋病，就會面臨方法論的選擇：如何將一個看似屬於行為的議題，既可理解其在個人心理或生理層面的意義，也能超越微觀的層面，考量社會文化的影響，以及個人與社會文化在特定歷史與國家政治處境中的位置。本文即以過去二、三十年來，人類學在愛滋病研究上所經歷的取向變遷，以民族誌的方法整合不同研究取向的重點與可能性，呈現疾病的多重面向，藉此理解愛滋病在諾蘇社群中發展成為流行病的初始軌跡。性別認同則是本文切入的理解面向，以年輕男子為主要研究對象，將主體的主觀與客觀的生命歷程，放在1980至90年代改革開放時期社會文化的意義轉變脈絡中，來鋪陳研究的主軸及事件發生的因果關係。如此的研究取向以人為本，由個體出發，往上研究文化、社會與國家。涼山的例子讓我們注意到，諾蘇社會中重視個別年輕男子在生命的轉型階段試煉膽識與向外探索；然而，卻在歷史情境的變遷中，讓過去的不平等以一種流行病的新面貌出現。

本文試圖透過此種研究取向，既不忽略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外力的因素，亦能說明社會文化特質在一個權力關係偏差的情境下，可能出現的衝擊與負面結果。這樣的多面向理解，有助我們對於所謂社會問題的解決之道，也有助於未來針對民間或政府防治政策及其實作的分析與檢討（Liu, 2011）。一般而言，在國際上推動的愛

滋病防治計畫中，外來介入者通常不以理解本土文化與社會脈絡為主要考量因素，不以其當作進入、理解或協助發展防治措施的助益力量，反而視其為防治障礙。這也是在許多非主流人群或非西方地區推動愛滋病防治計畫時，經常導致失敗甚至造成始料未及惡果的原因之一（Liu, 2009）。主導此類愛滋病論述與防治作法的機構，通常是「科學」論述至上的醫學界與政府部門。其慣行推廣的手段，則是源自西方且貌似國際通用的套裝防治策略。人類學者認為這也是一種「科學種族主義（scientific racism）」（Eves and Butt, 2008: 7）。

「文化」不應只是解釋疾病發生的刻板理由，亦不該成為理解與防治疾病的障礙。只有將文化影響與政治經濟的分析並重，才能理解文化如何在族群與權力互動中成為替罪羔羊。在一個多元文化、多族群的社會中，我們必須針對全球化、國家、社會乃至個人行為的諸多層面，詳細分析彼此間複雜的交錯關係與影響。如此才能呈現重要的事實脈絡，也才有可能替弱勢群體發聲，並去除基於誤解或刻板印象所產生的污名歧視。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林耀華（2003[1947]），《涼山夷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 馬長壽（2006），《涼山羅彝考察報告（上、下）》。成都：四川出版集團。
- 劉紹華（2010a），〈醫療民族誌中的性別角色：一個女人類學者的毒品與男性研究〉。見周平、林昱瑄主編，《質性／別研究》。台北：巨流，頁181-217。
- （2010b），〈從珍品到毒品：鴉片類物質的道德經濟學〉。《中國飲食文化》6（1）：27-61。

西文部份

- Baer, Hans A., Merrill Singer and Ida Susser (1997). *Medical Anthropology and the World Syste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Westport, CT: Bergin & Garvey.
- Beer, Bettina (2008). Buying Betel and Selling Sex: Contested Boundaries, Risk Milieus, and Discourses About HIV/AIDS in the Markham Valley, Papua New Guinea. In *Making Sense of AIDS: Culture, Sexuality, and Power in Melanesia*, edited by Leslie Butt and Richard Ev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 97-115.
- Bourgois, Philippe (2003).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urgois, Philippe and Julie Bruneau (2000). Needle Exchange, HIV Infec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cience: Confronting Canada's Cocaine Injection Epidemic with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Medical Anthropology* 18: 325-350.
- Boyle, Paul, Keith Halfacree and Vaughan Robinson (1998). *Exploring Contemporary Migration*. Harlow: Longman.
- China-UK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are Project (2001). *The Situational Analysis of HIV/STDs in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s*. DIFD: The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Davis, Mark and Corinne Squire, eds. (2010). *HIV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Techn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 Donaldson, Mike et al., eds. (2009). *Migrant Men: Critical Studies of Masculinities and the Migration Exper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 Eves, Richard and Leslie Butt (2008). Introduction. In *Making Sense of AIDS: Culture, Sexuality, and Power in Melanesia*, edited by Leslie Butt and Richard Ev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 1-23.
- Farmer, Paul (1992). *AIDS and Accusation: Haiti and the Geography of Bla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9). *Infections and Inequalities: The Modern Plagu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armer, Paul, Margaret Connors and Janie Simmons, eds. (1996). *Women, Poverty, and AIDS: Sex, Drugs, and Structural Violence*.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 Halfacree, Keith and Paul Boyle (1993). The Challenge Facing Migration

- Research: The Case for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7(3): 333-348.
- Herd, Gilbert H. and Shirley Lindenbaum (1992). *The Time of AIDS: Social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 Kaufman, Joan and Jun Jing (2002). China and AIDS - the Time to Act Is Now. *Science* 96(5577): 2339-2340.
- Kaufman, Joan, Arthur Kleinman and Tony Saich (2006). Introduction: Social Policy and HIV/AIDS in China. In *AIDS and Social Policy in China*, edited by Joan Kaufman, Arthur Kleinman and Tony Saic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p. 3-14.
- Kleinman, Arthur (1995). *Writing at the Margin: Discourse between Anthropology and Medici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leinman, Arthur, Veena Das and Margaret M. Lock, eds. (1997). *Social Suffer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oester, Stephen and L. Hoffer (1994). "Indirect Sharing": Additional HIV Risks Associated with Drug Injection. *AIDS 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9(2): 100-104.
- Kotabba, Joseph A. (1990). Ethnography and AIDS: Returning to the Stree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3): 259-270.
- Liu, Shao-hua (2009). Contested AIDS Stigmatiz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Human Organization* 68(4): 395-405.
- (2011). *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u, Yu (2001). Searching for the Heroic Age of the Yi People of

- Liangshan. In *Perspectives on the Yi of Southwest China*, edited by Stevan Harre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04-117.
- Marshall, Patricia Loomis, Merrill Singer and Michael C. Clatts, eds. (1999). *Integrating Cultural, Observational, and Epidemiological Approaches in the Prevention of Drug Abuse and HIV/AIDS*. Bethesda, MD: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 Mead, Margaret (1928). *Coming of Age in Samoa: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rimitive Youth for Western Civilisati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Ní Laoire, Caitriona (2000). Conceptualising Irish Rural Youth Migration: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6(3): 229-243.
- Parker, Richard (1994). Sexual Cultures, HIV Transmission, and AIDS Prevention. *AIDS* 8(Suppl. 1): S309-314.
- (2001). Sexuality, Culture, and Power in HIV/AIDS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0: 163-179.
- Pun, Ngai (2005).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Ray, Oakley Stern and Charles Ksir (2004). *Drugs, Society, and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McGraw-Hill.
- Schoepf, Brooke G. (2001). International AIDS Research in Anthropology: Taking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Crisi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0: 335-361.
- Singer, Merrill, ed. (199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IDS*. Amityville, NY: Baywood.

- (1999). The Ethnography of Street Drug Use before AIDS: A Historical Review. In *Integrating Cultural, Observational, Epidemiological Approaches in the Prevention of Drug Abuse and HIV/AIDS*, edited by Patricia L. Marshall, Merrill Singer and Michael C. Clatts.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pp. 228-264.
- (2006). *The Face of Social Suffering: The Life History of a Street Drug Addict*. Long Grove, IL: Waveland Press.
- Stockdale, Aileen (2002). Towards a Typology of Out-migration from Peripheral Areas: A Scottish Case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8(5): 345-364.
- Ten Brummelhuis, Han and Gilbert H. Herdt (1995). *Culture and Sexual Risk: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AIDS*. Amsterdam: Gordon and Breach Publishers.
- Treichler, Paula A. (1999). *How to Have Theory in an Epidemic: Cultural Chronicles of AID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Turner, Victor (1967). *The Forest of Symbols: Aspects of Ndembu Ritual*.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69).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Chicago: Aldine.
- UNAIDS (2002). *HIV/AIDS: China's Titanic Peril*. 2001 Update of the AIDS Situation and Needs Assessment Report. Beijing: UN Theme Group on HIV/AIDS in China.
- Van Gennep, Arnold (1960[1908]). *The Rites of Pass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Vance, Carole S. (1989).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Homosexuality, Which Homosexualit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ay and Lesbian Studies*, edited by Dennis Altman et al. London: GMP Publishers, pp. 13-34.

Willis, Katie and Brenda Yeoh, eds. (2000). *Gender and Migration*.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Zhou, Yongming (1999). *Anti-Drug Crusad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ationalism, History, and State Building*.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Navigating Youthfulness: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Shao-Hua Liu

HIV/AIDS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globalized epidemics in human history. Yet its transmission patterns and the social responses to it have been diverse among various localities and peoples. By examining the masculine identity and life transitions among male youths, this article seeks to answer why the Nuosu people in high mountains of Sichuan Province in Southwest China has a disproportionately large number of heroin users and HIV positive individuals relative to other peoples since the 1990s. Based on over twenty months of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a rural community, this research posits these problems as an unfortunate consequence of a highly complex social process in which drastic political economic changes, cultural and ethnic conflicts, as well as rising individuality among the young are intertwined. This convoluted social process illustrates a distinct case of the so-call AIDS pandemic in a multicultural and multiethnic society.

Key Words: AIDS, Drugs, Youth, Cultural Difference, China

Shao-hua Liu: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Email: shaohua@sinica.edu.tw)

Taiwanese Journal for Studi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Number 14 (April 2012), 77-112.

Received: 30 December 2010; Revised: 3 May 2011; Accepted: 22 May 2011